



4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湖北省沙市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沙市文史资料

88

HT189/21

沙市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刘作忠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沙市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本辑栏目设计：刘作忠

沙市文史资料

· 第四辑 ·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湖北省沙市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出版：沙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辑：《沙市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印刷：《江汉石油报》社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

印数：5000册

字数：150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报刊准印证：（1988鄂刊）字第91号

工本费 2.80 元

沙市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军政轶事	●湘鄂西“清剿”亲历记	韩 流	1
	汉口红十字会荆沙救护记	李白贞	33
	沙市电信局职工反撤退的斗争	刘传意	40
	●荆沙沦陷前后	晓 岚	45
	光复沙市见闻	鲁 坚	53
教育春秋	●朝阳学院在沙市	程幸超	56
	●国师迁置沙市的前前后后	朱翰昆	80
	日伪时期沙市的中等教育	杨文赋	89
	沙市的聘学	郑佳生	98
	●鄂都小学与雷鸣泽	张永大	105
	郑氏家族及通德私塾	郑昌淦	113
报业旧闻	我与沙市三育社小学	李东屏	118
体坛拾零	●我与《荆楚春秋》	刘兴林	121
	回忆《荆楚春秋》	沈涵陶	125
	沙市解放前的报纸概况	刘子云	129
工商史话	●沙市的民间体育与鄂西运动会	程幸超	142
	恒春茂的几位咸宁籍经理	方恒生	152
	●老东明绍酒酱园	宋勤高	158

本 编	阮 李 胡 陈 刘 王 梁 项 李 张 崔 魏 李 李 刘
审稿人员	隆 祖 吉 先 子 贤 上 开 永 忠 定 永 良 作
	阳 源 六 健 玉 清 贤 辛 进 太 培 富 发 喜 忠

百 业 名 人	●为构筑艺术圣殿操劳的一生 ——忆吾夫余上沅	陈衡粹	165
	●汉剧的一代宗师余洪元	何鸣峰	178
	我所知道的雷啸岑	胡兴东	186
	●亡友陶尧阶	刘鸣皋	192
	C·C高干陶尧阶	李明馨	208
	近代沙市书画名家王哲华	夏艺圃	219
	先父李玉珂及其牙科诊所	李金凯	226
	漫忆童月江先生	李继唐	232
市 政 沧 桑	●徐国瑞与荆江大堤的溃决	秦仲祥	239
	●沙市市政之建设	徐源泉	246
	●家父王信伯与沙市市政建设	王文伟	271
沙 津 风 物	解放初期沙市的城市建设	李耀昆	281
	●沙市习俗史话	徐树楷	288
	●甲戌本石头记中有关沙市的俗语	漆忠珩	300
史 海 寻 踪	辛亥起义时的沙市	徐树楷	307
	●沙市海关述略	李开进	311
	●火烧“洋码头”	王正国	317
	沙市海关档案资料(摘抄)		326

梁上贤整理

湘鄂西“清剿”亲历记

韩 浚

南京电召 祸福难分

1933年，日寇占我东北广大地区后又向我长城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冷口等地大举进犯。平津危在旦夕，形势极其严重。处于如此紧急关头，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但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，他只好作些象征性的防御姿态，命令徐庭瑤、孙连仲、商震等部到上述各口进行守备；又在南京成立所谓“北上抗日宣传总队”，大张旗鼓地向平津进发，以表示他决心抗日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宣传队的人员几乎全是“蓝衣社”的社员，其总队长刘健群即为“复兴社”中央干事之一，由此可以概见其余。他还一再叮嘱要对杂牌部队将领的言论和行动严加注意，多接近中下级干部，特别注视平津的学

生运动，等等，而对抗日宣传却一字不提。我当时任宣传总队的大队长，到北平后，表面上遵循蒋的旨意，同各大学取得必要的联系。实际上却同意学生们对“不抵抗主义”的严厉指责；同意师生们所提国难当头，国共两党应在民族仇恨的大前提下再次合作，团结起来，集中力量，共同对敌的正确主张。可是数月之后，终因事机不密，这些情况被当时在北平陆军大学学习的黄埔一期同学夏楚中（抗战时曾任集团军副总司令，后病故）知道了，他密电蒋介石说：“韩浚借抗日宣传作掩护，搞异党活动，向北平各校宣传共产主义。”不到几天，我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我“即日来京”的急电。当时我想蒋素来疑心很重，且又手段凶狠，这一定是夏楚中的告密起了作用。去与不去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时，蒋介石权势赫赫，炙手可热，耽于名利者接到此电，可能受宠若惊，趋附之不遑，但我却疑虑丛生，惴惴不安。反复琢磨：象我这个与他久已不相往还，在其政治天秤上已经失掉重量的人，何况还有一段夙怨未了，急电来召，祸福殊难意料。从好想，可能有什么紧急任务，让我东山再起，派上用场；从坏想，要么受到控告，新帐、旧帐一齐算，找我去重重惩治一番。但又冷

静考虑：蒋介石就是要惩治我，打一个密电给北平宪警当局，抓我易如反掌，何必要我去见他。想来想去，百思不得一解。“躲脱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脱”。于是，头皮一硬，到了南京。

时间大概是1934年5月中旬，我到南京见到了蒋。几句套话之后，他说：“贺龙先前在洪湖很猖獗，现又进入山区，是心腹之患，非彻底清剿不可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现在派你到徐源泉（注：当时任鄂湘川边区“剿匪”总司令，驻湖北沙市）那里当党政处长，要督促辖区专员、县长，切实组训民众，一切服从军事需要，不称职的一律撤换！”我听了蒋介石这番话，心想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党政军（陈果夫、陈立夫的C·C系、张群的政学系和黄埔军事系）三方面本来就不很和睦，要我来接这个差事，遵照他所说的去执行，不仅党政军所谓“三鼎足”的矛盾会更加尖锐，我也会因此得罪陈氏兄弟和张群，这些对我个人都是很不利的，不能不产生顾虑。思索至此，立即回答：我是军人，不懂政治。与其将来干不好，有负校长重托，不如现在把情况说明，请校长另外考虑合适人选。”蒋介石连说“不好，这样不好！”“既然你是军人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你先回北平准备一下吧！”我

再次请辞，他竟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干得了的，有困难打电报给我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什么价钱好讲呢？！只好表示服从。我回北平稍事料理后，先到武汉，再转沙市。当时的沙市虽然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城镇，生意茂盛，市场兴旺，但房屋低矮，街道湫隘，显得不够气派。我也无心游览市容，随即登车到了童家花园（当时徐总部驻地，现沙市第三中学）。我与徐源泉见面时他格外高兴，叙了乡谊，还表示相见恨晚。不久，我以徐的名义召集辖区部分专、县负责人开会，传达了蒋的旨意，要大家遵照执行。但军政矛盾，颇难解决，所谓配合，不过纸上谈兵，敷衍应付而已。当时，我见湖北第七区（后改第四区，辖区与现在荆州专区基本相同）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雷啸岑自恃来头硬，不大买帐，乃与徐源泉密商，拟以“妨碍军政配合”之名将其扣压，刹刹他的嚣张气焰，并震慑一下其他几个不大听话的专员和县长。徐碍于“政学系”关系，投鼠忌器，怕弄僵了，不好收场，要我谨慎从事。我也因才接摊子，情况了解不够深入，扣雷一事，只好作罢。后来，雷啸岑与徐矛盾激化后，他曾向我说：当初要是照你的意思，把他扣了，省得今天的麻烦。从达以后，我与该总部

及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逐渐混熟了，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以下数人：副军长马登瀛、参谋长苗松培、杨绍东、师长张振汉、参谋处长黄道崇、副官处长贾云蒸、军法处长刘翔等。另外还有一营宪兵负责总部警卫，维持沙市治安。不久，徐率其总部开往鄂西，我和党政处留沙办公。那时，徐源泉因见沙市市政设施过于简陋，就在以先“沟渠委员会”基础上扩组市政建设促进委员会，他自己兼任主任委员，沙市较有名望人士和商界大户多被延揽为委员。经过一番修建，市政建设确有相当成效，马路、公园、体育场均已粗具规模。实事求是，这点应当肯定。

“宝座动摇” 过河拆桥

留沙期间，我对蒋氏为什么要拼命“剿共”，为什么派徐源泉担任“围剿”湘鄂西根据地的主将、为什么又派我当党政处长这几个问题，以及湘鄂西战场形势和徐总部之所作所为……又认真思索了一番，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电，参合自己平日之亲身活动经历和见闻，有了些感性认识。

这里先说蒋介石为什么要拼命“剿共”的问题。回溯北伐战争，中国共产党人不畏牺牲，浴

血奋战，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很大的力量，蒋介石也因此声势大振，权倾一时。但他见利忘义，过河拆桥。土地革命时期，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先后击败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张发奎、冯玉祥、阎锡山等所统率的部队。在政治上，又挫败了“改组派”，踌躇满志，统治权欲极度膨胀，亟盼早日登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”。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迅速发展，在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，对其统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为了清除这种威胁，他决心实施“肃清匪共”与“召开国民会议”的两项重大措施。二者之中，又以前者最为重要。所以，“中原大战”刚告结束，立即掉转兵力，向江西的中央苏区和豫鄂皖边、湘鄂西等根据地大举进攻，以达到他清除障碍，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目的。

沙场点将 “冯妇”出山

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徐源泉这个杂牌将领，并派之为“围剿”湘鄂西根据地的主将呢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。当时国民党正式任官上将的28人中，鄂籍将领仅有何成浚、徐源泉二人。这确实非比寻常，盖因蒋介石对湖北军人素无好感，听

说军政部保荐鄂人某某任师长，因蒋介石的红蓝铅笔一挥：“鄂籍将领，不可重用”，遂致告吹。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场合说出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”的话来，引起鄂人反感。其实这只是历史传说。原来在封建时代，朝廷设置御史，以之作为谏议和耳目。除宰相外，御史成为朝廷的特殊人物，不必事先奏请，可以随时随地毫无阻挡地受到皇帝接见。

据说：明朝有九个御史，他们同奸臣沆瀣一气，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做尽了祸国殃民的坏事，好人深受其害。因而百姓把九个御史叫做“九头鸟”。所谓九头鸟，是指天上一种最凶恶的鸟。它有十个头，后被受害者砍掉一个头，只剩下九个脑袋。鸟血流到哪里，哪里就成灾。

当时的宰相张居正，是湖北江陵（今沙市荆沙村）人，公正廉明，深受国人尊敬和称颂。他奏准皇帝把这九个御使削职为民，全国欢欣鼓舞。很多人高唱：“不怕天上九头鸟，只要地下一个湖北老。”（此老非佬）但被参掉的坏御史反而把这两句话当作对湖北人的讽刺。

蒋因鄂籍黄埔学生金亦吾、吴兴泗等少数人拆烂污而迁怒湖北人，却对何、徐二人特别垂青；微妙之处在于何成浚与蒋介石既有日本士官

学校同窗关系，又在蒋与政敌的历次斗争中，均曾得到何的支持，往往变被动为主动。蒋信任之下，屡授何以军中总参议、行营主任、军团长诸要职。加之，何系清末秀才，旧学甚有根底，尤擅笼络之术。声色犬狗、棋牌剧艺，既嗜且精。凡与之接触者，鲜不由衷倾倒。那些绿林出身的杂牌军人，几经周旋之后，自然乐于为之效力了。象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作为蒋的政治砝码，其份量可想而知。

徐源泉早年投笔从戎，辛亥革命爆发时，参加了光复武汉的反清武装斗争。身先士卒，屡创清军，立下了战功。民国建立后，历任中下级军官，均以作战勇敢，爱护士卒见称。后来与张宗昌合股，先后投靠奉张、晋阎，也曾当过方面军司令、集团军司令等职，但总是战前拚命，战后被裁，一直蹉跎无成。何成浚看清了徐当时处境及其部队实力，因而在“中原大战”中许以金钱、禄位，拉徐投蒋。大战前，论军事实力，晋绥军及而北军联合起来，比蒋介石的中央军要强大得多。但蒋据有中央“正统”之尊，交通、地势之便，还得到江浙财团和英美国际势力之助，通过何成浚设在河南驻马店、漯河的“列车俱乐部”招待，晋绥军主要将领商震、西北军得力将

领石友三、韩复榘等先后倒戈，加上徐源泉归顺过来的十余万人（包括他收拢来的褚玉璞等残部），中央军实力骤增，优劣易势。在平汉路南段拉开战幕，几个回合过去，冯玉祥的西北军就被打垮了，徐源泉率部銜尾急追，一直把冯军赶到豫西才回师南京浦口。蒋介石夫妇亲往劳军，慰勉有加。徐也乘机“自矢忠诚”，取得了蒋的一定信任。其后，何始终是徐的顶头上峰，徐则因雄于资财，长期成为何的经济后盾，双方关系更为紧密。

再者，蒋介石虽在内战中获胜，但各路“诸侯”并不心悦诚服，再次爆发战争，随时可能。因此必须控制相当部队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况且“围剿”中央苏区又动用了大量军事资本，再抽出嫡系部队到湘鄂西作战，实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因此，经何成浚之保荐，加上蒋介石鉴于徐部在中原大战中所表现之骁勇，遂决定由徐源泉担任鄂湘川边区“剿匪”清乡督办，赴湘鄂西与红军作战。

至于徐源泉又为什么将其“督办公署”设在沙市呢？在其对湖北重要城市选择方案中，也不难找到答案：“沙市位于长江北岸，有公路北通湖北之襄樊，南至澧县、石首、监利均有公路。

扼鄂中水路、陆路之要冲”，更加沙市四周城镇均较富裕，素为物资集散之地，经济条件较好，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部的驻地，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。

为什么我会被蒋介石重新起用，去当这个“党政处长”呢？1934年夏，正是第五次“围剿”行将得手之时，他看到在湘鄂西单纯依靠军事不可能战胜红军，必须搬用在江西所曾采取的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的老套套，才能收“剿除”红军之效，遂决定在高级司令部内设立“党政处”，贯彻“战略进攻，战术防守”的精神，实行“党政军一元化”指挥作战。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调到徐源泉总部的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蒋介石对湖北籍将领素无好感，冰冻三尺，实非一日之寒，历史渊源由来已久。他历来以黄埔校长这块牌子笼络学生为其个人效劳，但有些黄埔学生却不听这一套，等而下之的如湖北的金亦吾、吴兴泗等，立山头，拉队伍，生活糜烂，大搞“三金、五皮”（三金系指金戒指、金手表，镶金牙；五皮系指皮靴、皮包、皮带、皮鞭、皮马鞍），社会观感很坏，有“黄虫”（蝗虫与黄虫同音，影射金亦吾等）之谓。蒋介石深恶痛绝，处治了这些人，并批示

“永不录用”。我在黄埔生中，虽不属于这一类型，但蒋介石也是很很不满意的。因为大革命时期，武汉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“反蒋委员会”，对蒋违犯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政策抨击最力，我是该会武昌区负责人，后来被蒋查知，开除了我的国民党籍，又被悬赏5000银元通缉。我到上海后，又和几个同学组织“黄埔革命同学会”，向全国发通电，骂蒋是新军阀。他暴跳如雷，串通巡捕房把我们关了一段时间。几年以来，我没再给他添麻烦，他可能认为我回心转意了，加上要在四省边区搞什么“特区”，需要找一个适当的人选，这是因为：1.可能我是黄埔一期生，在部队中关系较为广泛，又是湖北人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这次作战依托主要在湖北，人地相宜，可资熟手；2.我与作战双方主将，或者有旧，或者可以拉上关系。对贺龙而言，过去有些交往，情况熟悉；对徐源泉而言，以黄冈小同乡身份，便于融洽关系，开展工作，还可以就便掌握徐部官兵思想、士气、军纪、作战情况，随时上报。我的这些条件，蒋介石当然“胸中有数”。找来找去，这个差事就找到了我的头上。

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北伐时说起。北伐军攻克武汉后，部队在武汉整编，那时我正由苏

联学习回国，奉派为第11军教导营长，专门训练学兵。贺老总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，因工作关系，时有交往。贺龙那个军刚成立不久，需要大量下级干部，就要我为他培训学生。我专门是搞训练工作的，条件较好，就帮他训练了一批学生，毕业后都调到他那里去了。教导营的学生毕业后，我被调到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校参谋，那时张发奎是总指挥，贺龙也受张的指挥，每逢周末总部召开汇报会，贺龙和我经常参加，所以接谈的机会更多些。有一次，他要我到他的军部当训练班主任。因事，辞未就任。

我这个“黄埔系”军人，被派到徐源泉这个非嫡系部队里，虽然徐及其他将领表面上对我礼遇、亲热，骨子里却有所戒备，惟恐我向蒋介石打“小报告”，对他们不利，因而有些事背违我。这种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，我也有所觉察，于是，“瓜田李下，各避嫌疑”。不过，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交往增多，顾虑减少，从茶余饭后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也了解到一些事情，现就记忆比较清楚的几件事分叙如下。

巩固后方 军政矛盾

在第一次“围剿”中，徐源泉的部队虽然将